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话语与 中国新诗现代化

赵小琪◎著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赵小琪◎著



西方话语与 中国新诗现代化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 / 赵小琪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54 - 2

I. ①西… II. ①赵…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812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 理论的现代化

20 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艺术成就	(17)
20 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话语的理论维度	(40)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过滤机制	(52)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目的论建构	(66)

第二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流派、 思潮的现代化

现代性视野下 20 世纪中外文学的互动	(85)
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101)

无目的的目的——20 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	(123)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133)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对西方知性话语的误读 ...	(141)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符号诗的意义生成方式 ...	(157)
蓝星诗社对西方象征主义表情论的接受与化用	(173)
蓝星诗社对西方象征派诗美建构策略的化用	(191)
大学生诗歌的先锋性和流行性	(210)
台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及其局限	(216)
消解与重构——“后新诗潮”诗歌对“本体”的瓦解与重建 ...	(235)
台湾诗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247)

第三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

诗人的现代化

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	(265)
身份冲突中家的建构与功能——余光中	
诗歌中家的文化功能	(284)
余光中现代诗的中西视野融合	(295)
余光中诗歌二极对应结构论	(310)
洛夫对超现实主义的认同与修正	(324)
洛夫现代诗的中西视野融合	(341)
张默诗歌的生命宇宙化倾向	(355)
后记	(364)

序

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中国新诗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对现代性的追求。而毫无疑问，西方和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新诗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知识背景。不妨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它的基本指向，就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歌话语，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在这种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话语不仅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形态成为中国新诗颠覆古典诗歌的内在动力，而且随着西方话语在中国新诗领域的逐渐深入，赋予了中国新诗以现代性的形态、内涵和特质。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西方话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历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在瓦解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目标的同时，也为中国诗歌现代性价值系统的建构廓清了内涵空间。可以说，对于一个有着极为悠久而又极为沉重的传统的中国诗歌而言，没有西方话语的冲击和影响作为解构力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诗歌的建构就面临着巨大困难。然而，虽然这种影响是如此巨大，但我们仍然不能由此断定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被动接受西方话语影响中进行现代性建设的。事实上，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就此而论，我们所谈的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既涉及西方话

语是如何被中国新诗转述与置入的，又涉及中国新诗在选择西方话语时表现出的文化态度、接受方法和接受效果等方面的特点。



中国新诗的审美现代性建构，是在中外文学相互参照、相互激活、相互发明的接受结构倾向中演进的。这种互动的实践过程，促使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之间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生长点，为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大致而言，这种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一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沟通；二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说，不同文化和文学平等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在于促进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相互沟通，避免灾难性的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的冲突。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总是具有着一种“家族相似性”的。在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这种“家族相似性”，首先表现在两者都表现出了一种对原始性的综合性思维的重视和运用。境界说本为中国古代诗歌范畴，但朱光潜、梁宗岱等现代诗歌家却以西方现代诗歌范畴契合说进行阐释，朱光潜认为境界就是“情趣与意象契合”^①，梁宗岱认为“物我或相看既久，或猝然相遇，心凝形释，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就是契合，与“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相比，“物我两忘”的“景即是情，情即是景”的情景配合形态才是象征的“最高境”，它使外物和诗人达到了互为交汇、

①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

互为融合的境界^①。余光中认为：“在象征主义诸多特质之中，最令我们注意的两项”的一项，便是“官能经验的交融”，而在中国古代诗人“李贺的诗中也充分表现了”这种“特质”^②。洛夫则发觉，超现实主义文学与禅学都表现出了一种对反逻辑的直觉性思维的重视和运用。在中国新诗诗人中，对中西文学的“共同语言”的寻找非常用力的，还有叶维廉。在《语言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的长文中，叶维廉在对中西文学进行互照、互比、互识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跨文化、跨国度、跨时间的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之间的汇通之处。这种汇通之处在思维上的表现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其次表现在两者文学中使用的艺术技巧有汇通之处。“兴”本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范畴，梁宗岱却借用西方现代诗歌概念“象征”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他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③。余光中认为，象征主义最令我们注意的两项特质中的一项是“暗示性”，而“李贺的诗中也充分表现了”这个“特质”^④。洛夫则认为：“禅与超现实主义最相似之处是两者所使用的表现方式”，禅家的那种“其中所问所答、互不相干，看似一派胡言”的“对话方式”，“正是超现实

①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② 余光中：《象牙塔到白玉楼》，《余光中选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③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④ 余光中：《象牙塔到白玉楼》，《余光中选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主义诗人所使用的自动语言”。^① 在叶维廉看来，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在技艺上有许多汇通之处，它们主要表现在：“语音不限指性或关系不决定性→多重暗示性”，“不作单线（因果式）的追寻→多线发展、全面网取”，“连络媒介的稀少使物象有强烈的视觉性和具体性及独立自主性”。^② 叶维廉等中国新诗诗人这种从他种文化和文学的语境中反观本土文化和文学，又从本土文化和语境中去鉴照他种文化和文学，在相互比照中寻求中西文化和文学的共同话题和共同语言的方法，大大加深了他们对不同文化和文学的认识。它的作用在于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话语有相互沟通、相互契合一面的同时，也证实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的事实，从而减弱或消除了西方话语在中国新诗诗人心中造成的“影响焦虑”，使中国新诗诗人获得了与西方话语进行平等对话的位置。此外，它也说明，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都是人类大家庭的子民。在人类这个大家族中，只要他们能够消除那种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就能发现自我心灵中存留着许多人类集体记忆和经验。一旦这种集体记忆和经验在不同文化和文学中得到显现，不同文化和文学就可以在平等对话中进行相互沟通。

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包含现代性的因素，但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种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文化。由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无论是本土的传统文化还是闯入的外来文化，都是合理性 with 局限性并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话语也好，它们之中都既有合乎现代性的一面，又有不合乎现代性的一

① 洛夫：《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幼狮文艺》1969年诗专号。

② 叶维廉：《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面。这种并存格局，也就规定了任何一方的缺陷或不足，都必须由另一方的优点或长处加以补充。在中国新诗中，这种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的互补，一是通过对西方话语的精神和传统题材的融合来实现。郑镜明的《枫桥上冥想》一诗，是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的仿用。在对此诗的重写过程中，郑镜明极大地强化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对原诗的空白结构进行了颇富创造性的想象与追问。沈志方的《雨中读柳宗元〈江雪〉》一诗也是以古代著名诗人诗歌中的句子为基础，对原来诗歌的意义进行了新的开掘和提升。柳宗元原诗中蕴涵着较为强烈的孤芳自赏的意味。而这首诗则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挖掘，将原诗对自我存在的观照上升到对孤寂的艺术和艺术家永恒意义进行肯定的高度。在许悔之的《白蛇说》中，诗歌新的意义则是在历史文本的叙事声音与现代文本的叙事声音相互交织、相互对话中生成的。这首诗仍然以白蛇、青蛇与许仙的故事为原型，只不过白蛇与青蛇肉体上相互“触接”、“盘绕”的关系取代白蛇与许仙的关系成为了诗歌的言说重心。在传统道家看来，这种同性之间肉体上的相互“触接”、“盘绕”的关系是卑俗的，然而，在许悔之看来，女人一旦超越男权文化的控制，成为自己身体的主宰者，开始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身体欲望，那么，这种身体欲望就会因为真实之光的照射焕发着人性的光芒。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话语的形式技巧的融合来实现的。中西文学要想达到真正平等的对话，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文学要经过“现代转换”，而且西方话语也要经过民族化的改铸。在中国新诗中，这种改铸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话语的融合。从中国新诗发生的那一天起，种种社会现实和人生问题就一直挤压在中国新诗诗人面前，使他们不可能像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样，将个人本位的观念张扬到极致，使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而对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灾难

漠不关心。郁达夫在《诗论》中批评表现主义：“尤其是他们的作品的奇矫，难解的地方太多，一般人不能够同样欣赏，实在与他们所说的为民众的意趣相背。”客观地说，对个人体验的推崇，是人的主体意识苏醒的表征，它在取消历史给定的存在的先行结构时，也将民族生存中已被传统化为所是的存在，还原为荒谬，从而为长期被历史 and 传统损害的个体生命提供了表现和释放的机会。然而，当诗人们决绝地斩断现在与历史、未来的联系时，它不仅意味着他们与既有传统与世界的断裂，而且也意味着他们与希望、理想之间价值关联的中断。由此，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对传统和历史给定的个体所是极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理想导向的缺席，他们又无法寻觅到超越现实的有效途径，转而只能耽溺于对瞬间有限的满足的追求之中，使生命降格为生物性活着的生存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新诗诗人在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同时，又较为注重诗歌的社会性与民族性。穆木天不惜误读“交响”在象征主义诗歌中的本义，企图在象征主义的核心范畴的“交响”中注入个人性与社会性融合的全新内涵，他说：“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Correspondence），两者都不能存焉”，“国民文学是交响的一形式”，“国民的历史能为我们暗示最大的世界、先验的世界”^①。余光中强调指出：诗人应该“走在时代中间，知道时代潮流的冷暖，他还要走在前面一点，他才能把时代的轮廓看得更清楚一点”。^②穆木天、余光中等诗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定的系统，包括生命系统与艺术系统，都属于开放

① 穆木天：《谈诗》，《创造月刊》1926年创刊号。

② 余光中：《论明朗》，《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系统。这就意味着，生命系统与艺术系统只有与历史、传统、现实等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它才能满足自身系统的运动要求，从而不断充实、调节自身内部结构，并使自身系统不断以优化的结构态势向前运行。因而，中国新诗倘要扩展自己的艺术世界，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个人体验这个“点”的迷恋上，而应该从这个“点”出发，使个体体验具有一种穿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力量。只有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在揭示与发现人与大千世界中的种种联系的丰富意蕴与魅力时，防止人的另一种片面性生存的出现，恢复人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从而在个人化与历史化、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结合中，拓展出更为宽阔、更为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补与共存的艺术境界。

二

文学接受效果与信息传播活动的意图或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接受意图是否实现，接受目的是否达到，直接影响到文学接受效果。众所周知，追求国家的独立、完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既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进程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确立自己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正是源于这种追求国家与个人现代化的意图和目标，中国新诗诗人对现代性的西方话语进行了极大的肯定。由此，西方话语作为重要的制约性力量进入了中国新诗的内部，推动了中国新诗诗人和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西方话语对中国新诗诗人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指出：“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场合，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

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实现。”^① 以之观照中国新诗诗人，我们发现，中国新诗诗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由道德化、政治化的诗人转变为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诗人。

在中国新诗诗人看来，诗歌的流浪是历史性的，中国古典诗歌在文以载道的流浪途中离诗的本体越来越远。而造成这种流浪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诗人在靠近社会与时代时迷失了自我。因而，当李金发等在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之后，他们对诗的功利性就不能不表示强烈的否定。李金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② 而自我与自我内在情感则作为诗歌的本体得到强调：“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③ 在李金发等人的诗中，诗人的内在情感既是纯诗的出发点，又是纯诗的归属点。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宣称：“《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④ 当现代派诗人将现代情绪视为纯然现代诗的表现尺度时，他们更多考虑的只能是诗如何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需要，如何通过审美需要和价值的实现来证实和确立自己的地位。余光中宣称：“与其可歌而一览无余，不如不可歌而含蓄至深；与其浅薄得妇孺皆

① [美]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② 李金发：《烈火》，《美育》1928 年第 1 期。

③ 李金发：《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文艺大路》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

④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1933 年第 4 卷第 1 号。

知，不如微妙得子期独赏。”^① 如果考虑到在漫长的历史中“大我”与群体价值对自我与自我情感的长期压抑而导致后者的不自由状态，那么，这种对以自我与自我情感为中心功能观的弘扬，就理应被当作一种对那种导致诗歌丧失抒情本质和功能的载道观的反动，它是诗人主体意识强化的表现，显示了人的主体性日趋广泛而又深入地受到中国新诗诗人关注的趋向。在对传统功利观的否定中，中国新诗诗人就这样在对自我与自我情感的肯定中发现了主体解放的巨大力量。

其次，西方话语对中国新诗内容、语言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传统诗歌中，个体生命常常作为一个道德符号被加以认同。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话语，而只能按照整体精神的要求去迎合他者。而在西方话语影响下，中国新诗诗人将历史话语构造的作为个体生命的非存在性囚笼进行了拆解，使个体生命的欲望从历史强制赋予的必然性中解放了出来。穆木天认为：“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的^②。生命，在穆木天等诗人那里取代了伦理道德而成为人类的本体，诗歌活动与本体也只能围绕人的生命来展开。袁可嘉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③ 因为，生命本体与诗歌本体是互为存在的，诗歌越向生命纵深处延伸，诗歌作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以及人的存在的本源意义越能充分地敞开。由此观之，诗歌要想获得永恒的审美价值，就必须充分地敞开被历史、政治等外在之物遮蔽的原始本真的生命。新诗潮诗群的整体主义诗派在他们的宣言中声

① 余光中：《摸象与扪虱》，《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② 穆木天：《谈诗》，《创造周刊》1926年3月1卷1期。

③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称：“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①在此，生命的纯粹性存在之于诗的崇高与永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对诗歌透彻的了解，就不会对生命进行如此的膜拜。而反过来说，这种对存在的本真与生命的纯粹状态的膜拜，在拓展了人的生命存在可能性的同时，也使诗歌在生命存在的价值上表现出了它的崇高性与纯粹性。

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语言、形式意识的觉醒是同构的。诗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总是促使诗人寻觅最能充分表达这种真实的生命存在的最佳语言和形式。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功能论总是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新诗诗人则依据西方话语，强调诗歌形式结构对于诗歌的本体论意义，从而动摇和否定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论中所体现出的内容对形式的决断论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诗人一直在寻找诗之为诗的艺术形式与语言。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谈诗》中提出：“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②在《再谈诗》中，王独清提出了“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语言受我们底操纵。”^③音乐的声音与诗人内在生命的声音都具有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因而，对诗的音乐性的追求与强调，表现出的是音乐对诗歌语言形式本体论建构的意义。不过，穆木天、王独清等象征派诗人对诗歌语言、形式本体论的开掘尚不够系统深入，将语言形式本体论推向深入发展的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和现代诗社诗人纪弦等人。戴望舒在《望

① 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98》，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 页。

② 穆木天：《谈诗》，《创造月刊》1926 年创刊号。

③ 王独清：《再谈诗》，《创造月刊》1926 年第 1 卷第 1 期。

舒诗稿》中强调：“（1）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2）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① 诗与音乐、绘画虽然具有互渗的关系，但音乐、绘画终究属于其他学科。要求诗歌与音乐、绘画的分野，就是要求诗人将诗歌作为一个有自身的形式结构的独立体来看待。因而戴望舒强调指出：“诗本身就象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② 本身就像一个生物的诗，它的存在只能是为诗而存在而不能以其他生物体的形式而存在。而寻求诗歌独有的自身的组织形式，又离不开对诗歌自身语言的建构。究其本质，诗歌自身的组织形式又总是以其自身的语言结构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的自足体的生成又是离不开诗歌自身语言建构的。正是强烈地意识到语言对于诗之为诗的这种重要性，经历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洗礼的新时期诗人对诗歌语言之于建构诗歌的本体意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充分重视。新诗潮诗人韩东强调指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这个‘语言自身’早已存在，但只有在诗歌中它才成为了唯一的经验对象。”^③ 而这种排除了诗歌语言之外的功利目的的诗歌语言在于坚那里得到了具体的阐释：“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④ 这种流动的语感是对传统的普遍的理念对符号性语言的任意处理的反动，“是生命有意味的形

① 纪弦：《战斗的第四年，新诗的再革命》，《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台北故乡出版社1979年版，第389页。

② 戴望舒：《诗论零札》，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2月6日第2期。

③ 韩东：《自传与诗见》，《诗歌报》1988年7月6日。

④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诗歌报》1988年7月4日。

式，是诗人心灵的呼唤”，^①是生命感觉状态的一种有机呈现。由是，诗歌在回到语言之时，语言也就成为诗人与诗歌的存在之家。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在回顾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时，都不能不承认，中国新诗发展史不是被西方话语逐渐淹没、自我话语完全丧失的历史，而是由聆听、转述西方话语再到主动发问的历史。我们认为，对历史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非常容易，关键在于理解历史，理解中国新诗诗人当时选择的历史合理性。20与21世纪之交，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诗歌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自身话语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而除了借西方现代形态的话语来实现自身诗歌的变革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得力于对西方话语的聆听和转述，中国新诗才能创造性地发展自身。如果没有对西方话语的引入和创造性接受，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与建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也近乎痴人说梦。20世纪中国新诗追寻现代性的任务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但它给21世纪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深刻的警示，那就是，必须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派生出的两种倾向保持警惕：一是对西方话语拒绝接受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它使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二是对西方话语采取完全顺应的态度。这种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象征派、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社的前期诗歌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其结果，则是在他们的作品中西方他者的陌生性依然存留，而接受者的主体创造性却受到了压抑。在我们看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序列中的一个方面或侧面而存在的中国新诗或西方话语，并不存在

① 于坚：《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